

外交官生涯

〔英〕埃里克·克拉克 著

杨 修 祖 源 译

Eric Clark
Corps Diplomatique
Allen Lane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Ltd
21 John Street, London, WC1

责任编辑：俞纪民
封面设计：孙为平

外交官生涯
〔英〕埃里克·克拉克 著
杨修祖源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7.875 字数：196,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

书号：17003·1063 定价：1.35元

序《外交官生涯》

从现代意义来说，外交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送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

这段定义性的话说明，外交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但是，事实上，远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存在着外交活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原始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就有交往，或谈判战争与和平，或协商物物之交易，这未尝不是外交，不过当时没有外交这名称而已。只是当时的外交任务，大多由首长之类的人物自己承担。从史书看来，在我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没有专职的外交官；外交事务由政府官员兼办。帝王诸侯遇有外事，则临时派遣使臣出国办理。

只有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外交才能发展起来。据西方记载，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欧洲各国城邦国家为了争权夺利，为争取与国，进行政治交易，谈判又谈判，不断改变结盟关系，因而经常进行谈判的政治家成了专职的外交家。到十五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常设的使馆。然而，外交工作具有今天这样的价值和作用还是十九世纪的事。我国清朝在自守的闭关被鸦片战争打破后不久，要效法西方，兴办洋务，于十九世纪末与少数欧、美、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了使节，开设了使馆。

二次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为世界各国外交官提供了多边

外交活动的场所，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兴起，有六十多个殖民地国家变成独立国家，它们纷纷与一些国家互派使节，这才使外交工作蓬勃发展，具有了真正的世界规模。专职的外交官队伍日益扩大。一些较大的国家，尽管屡次要裁减外交人员，但其膨胀的趋势不可抑制。例如1914年间，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大英帝国，其外交部的职员只有一百七十六人，在国外的职员也只有四百五十人。可是到了六十年代末，英国光是在国外的外交官多达六千四百人，另有专员二百四十人，这还不算在当地雇用的工作人员七千人。又如美国，1936年国务院的全体人员可在国务院门前合影，而到六十年代后期，人员超过一万一千，其中在国外者七千。

国际交往之频繁，外交业务之蓬勃发展，恰好反映出世界在日益缩小。一个国家，特别是较大国家的重大政策和措施，不论是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或是军事的，会影响一大片国家。任何国家要生存下去，发展起来，都不能不与别的国家打交道，不能不发展外交工作。外交政策的失误也会影响国内的发展。

近年来，外交界时常谈论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当今国际交通和通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外交官的权力大大缩小了，他们的作用是否无足轻重了。在实际生活中，外交工作的确有了与过去不同的地方。例如，大使要作出重大决定，必须向国内请示，几小时内即可得到答复；又如，要参加某一专题的国际会议，飞机很快会把专家载送到会场，毋须大使操劳。过去外交官往往是对外谈判的唯一代表，可是现在总统、主席、总理、首相、外交部长以至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等等满天飞，由于他们承担重大的或专业的谈判任务，似乎把外交使节置身事外。于是，有些人认为外交官的权力削弱了，作用缩小了，身份降低了。有人认为外交官只是其政府的“传声筒”而已。加拿大前总理特奇多称外交官为“光荣的记者”、“国宴席上的递菜劝酒人”，甚至贬为“多余的无用之辈”。

与“传声筒”论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国数日增，形势复杂多变，洲与洲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交往日繁，关系愈密，影响更显，外交正是多事之秋，也是外交官大显身手之时。他们认为，外交官能否很好地执行本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外交官的素质和修养。

诚然，外交官的工作范围，现在比过去宽多了；对外交官的要求，现在比过去高多了。外交官不但要掌握本国的国情国策，熟悉所在国的底细，还得掌握国际形势，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他应有渊博的知识，除本行外，也应懂得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虽不门门精通，但需略窥门径。他不但能执行政策，还要善于建议；他既要坚持原则，又能随机应变；要美于辞令，擅长谈判；既能办公事，又能交朋友。再则，外交家的风度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代表着本国的形象。

《外交官生涯》一书的作者埃里克·克拉克是英国的记者。为了编写此书，他花了三年多时间，遍访了英国的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加拿大外交部等官方机关，出入于一些国家的新闻处和图书馆，请教了专家，拜访了职业外交官，广泛收集材料。

此书涉及面很广，举凡外交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包含进去了。它论述了当今世界外交界的现状；介绍了各国外交官的招聘和培训方法；列举了外交官在贸易、领事、军事、宣传等方面的任务；论证了外交特权的范围和大使的作用；描绘了外交官的生活状况。此外，还专辟三章，分别介绍了大使馆与间谍活动的关系、联合国的外交官以及第三世界各国和梵蒂冈的外交官现状。从这么多方面来介绍今天的外交界和外交事务的书是不多见的，因而此书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尝试。

此书不是学术性著作。因作者是记者，擅长写夹叙夹议、列举事例的文章，所以读来饶有兴味。他广证博引了当代政治家、外交家的言论和观点，铺陈了近年来外交界发生的大量事例，可谓论点和材料都相当丰富。作者在字里行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有些，笔者是无法苟同的，但作为一家之言而存之，请读者自己辨别。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对于我国外事工作者来说，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参考书，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对于一般读者说来，可以粗略窥探外交世界的小天地。

王克勤

1985年3月8日

目 录

致 谢

1	第一章	当今世界的外交官
22	第二章	新外交官的招聘和培训
41	第三章	国内的外交机构：外交部
60	第四章	国外的外交机构：大使馆
78	第五章	外交人员的游牧式生活
99	第六章	外交特权
116	第七章	大 使
142	第八章	外交官在国外的工作：贸易和领事
164	第九章	外交官在国外的工作：军事和宣传
183	第十章	大使馆和间谍活动
206	第十一章	梵蒂冈和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官
221	第十二章	联合国的外交官
237	结 束 语	

第一章

当今世界的外交官

在当今通讯设备发达的时代，对许多人来说，外交官已成为不合时代的人了。外交官象靠风行驶的帆船一样，已属于另一个时代。过去，在远离本国决策者的情况下，外交官曾一度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言行有着重大的意义。

上个世纪中叶，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因擅自作出决定而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有一次，土耳其要求他作出保证：如土耳其遭到俄国和奥匈帝国的进攻，英国就对它们宣战。爵士没有获得授权，而要得到本国政府的授权须花两个月的时间；于是他自行作了承诺。

如今，不管外交官在什么地方，他只是守在电话线一端的信息传递者。如有重大事务，政府负责人、政治家或专家可以在几小时内把情况传送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他们的电报其实已不再包含外交官们翘首以待的消息，大部分情况早从电视或通讯社的电讯中获知了。

一位美国评论家最近断言：“过去意义上的外交已经结束。”然而，如果说外交官已经不起作用，那么最后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外交官自己。外交职业曾经是本世纪相当发达的行业之一。1914年，在英国首都伦敦任驻的外交团长共有15个，而到1971年，已增加到114个。他们手下还有别的外交官，从等级较低的三等秘书到参赞、公使等。六十年代末，在伦敦享有不同程度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交官及其夫人超过了3,300人，比1945年

增加了一倍多。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并没有消失，而是增加了。

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手下只有5个文书、两个信使和1个兼职翻译。而到1936年，美国国务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可以列队在旧国务院大楼前的台阶上一起合影。到1968年，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超过了11,000人，其中有7,000人在261个驻外机构任职。

1914年，英国堪称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其外交部的国内职员只有176名，其中还包括清洁工及门卫；在国外职员也只有450人。到1969年，尽管英国的国际威望已大为降低，但却拥有6,400名外交官和将近240名专员在各使馆工作。此外还雇用了7,000名当地工作人员。

1945—1970年之间建立的60多个新兴国家，也向世界各地派出了外交使节。恩克鲁玛为了庆祝加纳独立，一共开设了70个使馆。根据对等原则，老国家也向新独立国家派出了自己的使节。

尽管已经过时，但外交官所提供的情况却是大量的，而且是真实的。华盛顿的国务院每天收到的电报达2,000份之多，发出的电报也有1,000份。每天书写、阅读的文字达100万字。每年文件的数量达900万份，其中150万份被称作最新文件，每天都靠这些文件获取情报。

医生也许已对外交官宣告了死讯，殡葬人也许已等待着埋葬尸体，然而尸体看上去仍很健康。外交官也许会说，发布他的讣闻还为时过早。但他知道，他的继续存在已成为问题。特鲁多总理的话语好就好在它十分直率。外交官被称为“光荣的记者”、“国宴上的递菜劝酒人”、“临时领受津贴的贵族”、“多余而无用之辈”。他们的形象确乎不高。他们就是那种人——要么不干事，要么干蠢事——就象1968年外交官们为越南的和平谈判该用什么样的会议桌而争吵不休那样。

对外交官作用的怀疑决不限于一个国家，不少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和所作的调查报告就反映了这一问题。英国、加拿大、挪威、

联邦德国等都在研究外交官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仅美国就进行过8次大的和几十次小的调查。

外交官也被迫进行自我检查。一位加拿大外交官在一份背景材料中说：“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是否需要，这看来是很奇怪的，但也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扪心自问：我到底在干什么？”

事实上，外交官已经开始反躬自问，尽管还很难说他们是否已决定要真正起到恰当的作用（即使这可能意味着大变动，包括大量裁减人员），抑或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只要作些微小改变就能奏效。

外交官们最关心的是，那些批评他们的人，那些怀疑他们的存在是否必要的人，应该设法了解他们今天实际所做的工作。

“有时候”，一位荷兰外交官说，“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受到指责，不是由于我们本身的状况，而是由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是些生活在虚构的外交世界里的人，必须对那些愚蠢的政策负责，或者以为我们还象40年前那样。”

“我们完全被误解了，”英国一位外交官说，“问题不在于我们干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的上司、公众百姓以及在国内政府部门工作的同事们对我们的印象。我有时候想，外交部门与其搞那么多调查，还不如将这笔钱用来雇几个搞公共关系的公司，让人们看看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样，人们就能决定是否还想让我们来个改变。”

许多外交官会承认，产生这种“虚假形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喜爱神秘和隐蔽。一位行将退休的美国大使，颇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谈到了他多年来是怎样在使馆接待去访的政治家和其他代表团的：“我用酒菜款待他们，替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但我现在觉得，我那时真应该让他们到使馆的每一个办公室去走走，让他们看看我手下的人都在干些什么。如果发现有人呆在那里无所事事，那倒也罢了。但是他们一定会看到，跟别的部门一样，这是个工作的场所，而不是在搞什么鸡尾酒会。”

外交官不满人们对外交政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外交官的职责不在制定政策；那是政治家和政府负责人的事。外交官的任务在于执行政策。他向外国政府转达某一政策的具体内容，设法加以解释，以获得对方的支持，并奉命与对方进行谈判，签订协议，以便更好地体现和实施这一政策。

出现这样的批评，有些是由于没有把事情弄清。斯特朗勋爵表示：大部分这样的批评“一经分析，就知道是跟某些具体的外交政策有关，而这些政策并非由外交官们制定，因而也没有理由去指责他们”。据称，1971年，尼克松总统曾对驻日本大使表示不满，嫌他不够强硬。当时一位美国的退休外交官就表示反对，他说：“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极为复杂。如果把责任推到美国大使身上，那真有点象把你祖母的去世怪罪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邮递员身上那样。邮递员只是传送噩耗而已。”

这么一来，外交官当然两边沾光了：如果失败了，就归咎于政策；如果成功了，那也许是因为政策不错，但也有外交官的一份功劳。

然而，外交官们在声明他们无须对政策负责之后，还声称自己并不仅仅只是“邮递员”。他们如何介绍、解释别人制定的政策是很重要的。谈判也许是外交官最重要的职能，因此谈判者的技巧和专业知识的雄辩、解释和妥协，就会反映到所达成的协议中去。

外交官们认为，无论谈判的问题重大与否——或是同意开辟新航线，或是决定新成员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或是确定美苏军备控制协定的细节——上述情况并无什么变化。

他们争辩说，正是外交官在谈判双方之间寻求着共同点，估量着对方能走到什么程度，然后确保他的政治上司的意图都能恰如其分地包含到所达成的协定中去。

可以将外交官与律师作个类比，律师总是尽其所能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但是外交官会说，这里还有一点差别：外交官和律

师不同的是，他不是为打赢官司。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外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高妙之处在于不仅使本国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无论是一项条约，还是交换学生，或是一项贸易协定，而且还得让谈判的对方国家满意。即便你在某件事情上与对方达成了协议，但仍须记住，明天还会有别的谈判。”外交官们认为，重要的正是这种长期性。希特勒确实获得过外交上的一时成功，可是……

他们还表示，外交官在谈判中仍能发挥某些灵活性。有时，国内的指示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大使就必须当机立断，做出会获得本国政府支持的决定。

但是，外交官在这方面的权限只限于某些次要的事情上。如今的外交官可以不经发电请示，同意对某一大会的决议作微小的改动；但他不会擅自让本国在稍为重要一点的事情上作出承诺或承担义务。一位联邦德国外交官承认：“我觉得自己与其说是历史的创造者，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旁观者。”而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通讯不便，把消息从罗马传递到伦敦所花的时间与凯撒时代一样久长，因此大使赴任之前都带着伸缩幅度很大的指示。对于传送给他的具体指示，他往往不屑一顾。马尔姆斯伯里勋爵说过：“我从来没有接到过值得一读的指示。”但那种权力已一去不复返了。已故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是位精明强干的人物，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曾向高尔布雷恩教授抱怨说，国务院甚至“告诉他大约何时去会见葛罗米柯，何时中断谈话去上盥洗室，在那里应呆多久”。

外交官还认为，一个人仍然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改变另一个人的态度。如果那另一个人处于决策地位，那么外交官还是有影响的。1972年召开关于人类未来及世界资源的第一次大会^①时，大

^① 会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届会议”，1972年6月5日—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译者

会秘书长首先得行程万里，去说服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脑参加会议。英国前驻伊朗大使戴尼斯·赖特爵士说服伊朗国王放弃了对巴林的领土要求，从而在外交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退而言之，我亲眼见过一位欧洲驻北非的领事官员说服了一位当地官员改变有关规定，允许给他的一位同胞签发工作证书。

但是下述这种例子看来是很少的，或者是极为罕见的。“英国政府会因为我们驻伦敦的大使讨人喜欢而改变对直布罗陀的态度吗？”一位西班牙高级官员说，“当然不会”。

尽管外交官承认，在重大问题上，他必须严格按照国内的指示行事，但他仍然认为，他向国内报告的情况对于国内作出指示有着一定影响。一位法国外交官强调说，如果法国要跟他任驻的国家进行交涉，他可以向政府提供影响该国谈判地位和力量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该国存在国内问题，它在外交上就不愿冒险，因为既然它在国内问题上已经搞得不得人心，为什么还要在别的事情上冒遭人攻击的危险呢？”正是根据这种建议，政府可以决定：在某一时候，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实际的，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则是不实际的。

外交官的论点是，不是说世界并未改变，而是说他那长期养成的策略和耐心、谈判的技巧、理解能力以及缜密严谨等品质仍然十分重要。至于他所起作用中应该改变的部分，他已作了改变。

外交官赖以施展其本领的世界已经改变，并还在改变中。现代外交作为一种有专职人员、有常设机构的有组织的职业起源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当时各城邦国家为争夺权力而不断改变着结盟关系，因而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之间必须经常进行谈判。十五世纪中叶第一个常设使馆的出现是迈出的重大一步。但是，只是到了上一个世纪，外交工作才真正得到了发展，具备了今天外交工作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而其中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以来发展起来的。

最为明显的是高速国际交通和通讯联络的发展，其影响不只在于缩小了外交官作出现场决定的权力，它意味着国内专家可以迅速飞往外国首都。比如想与斯里兰卡商谈海运问题，可派遣这方面的专家；如要去美国参加捕鲸会议，可派本国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率团赴会。在古典外交时代，除极个别情况外，外长和首相总是留在国内的。而现在，是冰岛外长到伦敦商谈捕渔区问题，法国国防部长飞往华盛顿讨论一般性的军事政策问题。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头21个月中，共有50多位外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相继访问了美国。

这就是今天的外交官极不喜欢、但又必须接受的情况。他们声称，这种做法是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混合了起来，将使两者都受到损失。外交官争辩说，无论如何，他们在为政治家进行访问的准备中起了主要作用。一位联邦德国参赞说：“政治家到达之前，必须给他介绍情况。逗留期间，必须给他作出种种安排。离开之后——也许他作出了一些含糊的承诺或是达成了一些不明确的协议——我们还得进行善后工作，设法把他思想中已经同意的东西付诸实施。”

一位加拿大大使概括了外交官中普遍存在的观点：“你默默无闻地耐心为某事工作了几个月，当一切就绪时，部长飞来了，用金笔在文件上签了字。这时，国内的人都会想，部长真了不起；并会说，我们这些外交官已毫无用处了。”

跟高速交通和通讯联络的发展同样重要的还有强大的公众舆论的产生。老式的外交官一想到公众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起作用，一定会感到愤慨。斯特兰爵士曾经说过：“公众舆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外交关系中使用秘密方法则是世所公认的，必不可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突然居统治地位的美国人把对外交的不信任带进了国际事务中。不仅美国人，而且其他许多人都认为，秘密外交导致了战争；外交应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伍德罗·威

尔逊总统要求“公开地缔结……公开的盟约”，强调一国的公民有权知道以他们的名义达成了什么协议。后来，威尔逊对于他声明中的“公开地缔结”这句话作了退让。他在给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的信中解释说：“在我宣布进行公开外交时，我不是说对于微妙的问题不应该进行私下讨论，而是说不应该达成秘密协议，业经确定的国际关系都应公诸于世，光明正大，措词明确。”尽管如此，公众有权知道具体内容依然是现代外交的组成部分。

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向国内的选民负责，至少在一般性的政策问题上是这样。对于外交官来说，这意味着他应设法直接吸引外国公众。“大使与国王咬耳朵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一份英联邦外交讨论会的报告写道。“由于新闻媒介的发展，大使们更多的是向记者、农民、学生、工人等发表讲话，而不是与国王和政府首脑交谈。”

结果，导致了新闻工作、文化活动、贸易展览、教育交流等的发展，而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求外交官参与。

在公开场合，今天的外交官必须具有某种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在过去，如果一位大使被邀请去主持足球赛的开幕式和酒吧间的开张仪式，或者宴请正在那里访问的演员，他会感到十分诧异。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头天晚上带领使馆人员观看“果酱流行歌舞团”的演出之后，在使馆设午宴招待了演员们。他在海牙的同事为在那里的第一家英国酒吧间“玫瑰与桔子”主持了开张仪式，并打开了第一瓶啤酒。

上个世纪末，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莱昂伯爵在那里任职5年，却没有作过一次公开讲话。现在，许多国家要求其大使突出自己，有些大使勉强这样做了，有些因而遭到其同事们的暗中反对，认为这有损于大使的道德风尚。七十年代初，西班牙新任驻伦敦大使在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后返回官邸，然后端出两杯啤酒，当着摄影记者的面送给了站在门外的司机和警察。他走出这革命性的一步之前，首先打通了典礼官。但是，他的邻居、伦敦贝尔

格雷夫广场的其他许多大使却嗤之以鼻。“坦率地说”，其中一位表示，“我决不会干那种事。”

一些不乐意或不善于直接接触公众的大使通过间接的办法工作得很好，那就是通过新闻界而不是直接与“人民”接触。这样做，外交官必须与新闻界达成妥协；在某些方面，报纸可以说是他的天然敌人：报纸总是想披露他想隐瞒的东西。在外交官的眼里，记者总是把复杂的情况歪曲或简单化。

有些外交官与新闻界的关系搞得很好，经常给记者举行吹风会，介绍和解释本国的政策和行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许多报纸都反对尼日利亚政府，但是尼日利亚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却出色地对付了当地记者。

外交官们说，外交工作中代表政府的一面越来越难做了。一位大使说：“过去，你只要跟着国王走走就行；现在必须设法受到总统、当地进口商、电视采访记者和工会的欢迎。”一位在一个小国任职的英国大使认为，在代表本国形象方面，他做得最好的一次不是去打动当地政界人物，而是经过认真准备，在电视上用晦涩难懂的当地语言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他的一名当地雇员向我肯定了这一点。他说，“看了那次电视讲话，我几乎要哭起来。那次讲话帮了你们国家很大的忙。这种语言很难，但他的口音那样纯正。他确实不怕麻烦……”

另一个发展是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崛起。它们互派外交官，为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奋斗。外交官因而必须进入援助领域，参与谈判，提出建议，有时还得具体实施。

国家数量的增加也降低了社会名流的水准。一位美国政界人物说：“在连布隆迪都有我们大使的时候，你还能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吗？”

老的外交界是一个小天地，他们出身高贵，并有才华，象绅士那样互相交往。现在，他们不仅要容忍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官进入这一天地，还要容忍苏联外交官进入，而后的行动准则是

根本不同的。他们根本没有绅士风度。他们以斗争取胜。在他们看来，问题只有一面。他们毫无灵活性，因为他们必须一字不差地服从命令。他们的举止也与温文尔雅的传统外交官大相径庭：传统外交官谈吐圆滑，苏联外交官却粗暴直率；前者言词委婉，即使侮辱性的话也说得娓娓动听，后者却蛮横地进行争辩。但苏联外交官有一点是跟他们的西方同事共同的：他们在国内统治集团中的权力并不比西方同事要大，而事实上往往要小。

复杂的现代生活还带来了其他重大进展。这涉及一系列的问题，不少是技术性的，只有放到国际范围中去讨论。这些问题范围很广，从污染到金融政策，从农业到劳工，无所不包。

过去只在两个政府间（双边）进行的不少外交活动，现在要通过几个政府间（多边）的谈判来处理了。现在国际组织大为发展，国际会议大为增多：美国每年向50多个国际组织交纳经费，参加的主要国际会议在400次以上。

这对外交官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不少人必须学会在公众场合进行工作，而其顶峰就是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这种场合，电视摄像机远比其他代表更为重要。第二，他们必须关心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这是他们的前辈永远也不会承认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外交只是一种典雅的政治活动。第三，他们必须承认，当今外交活动的很大部分已由各方面的专家而不是再由他们来进行，专家们集合到一起，进行磋商，作出决定。

非外交官的专家进行外交工作这一现象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外交官的作用缩小到了陪衬的地步。举例说，就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而言，当地英国外交官的主要任务只是象英国邓肯委员会关于驻外机构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起到“开门引路”的作用。重要的工作是由从伦敦来的专家们做的。当地7名外交官的工作只是提醒伦敦注意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报告日常工作情况，并在专家刚刚到达巴黎时让他们适应复杂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有些国家已设立单独的机构从事国际贸易、援助、新闻和文